



一家之言

王安石变法下的大宋之变



编者按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认为，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年司马光离世，24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

赵冬梅

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接近于理想状态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在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统一的安全和皇权的安全。

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能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政策制定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

并加以纠正。

影响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是人

北宋政治有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其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性情，政策倾向与批评纠错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是人，可以分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其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

作为皇权的行使者，皇帝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时间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续，和空间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间统治者，皇帝代表着包括朝廷国家和社会在内的江山社稷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应当作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选择和决定。这是抽象的皇帝。

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权力让他可以任意妄为、打破一切制度和传统的约束，当然，这样一来，皇帝本人、朝廷国家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具体的皇帝。

抽象的皇帝通过具体的皇帝来表达、行使皇权。如何让具体的皇帝更接近于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战。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应当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国家与社会利益平衡原则，避免个人私欲的过度膨胀；抽象的皇帝还应接纳士大夫对皇权的约束，对批评采取开放态度，承认这是一种正向的力量。那么，怎样才能让具体的皇帝做到这些呢？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传统的熏陶、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士大夫集团特别是宰相大臣的引导。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具体的皇帝的具体遭遇所造成的具

体心理状态，会影响甚至逆转政治的方向。

其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枢密院分掌军政，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与枢密院合称二府。二府长官构成了广义的宰相群体。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同时拥有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和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因此，不管是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批评机制的维护，宰相的想法、说法与做法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作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导、规谏皇帝，作为政府首脑，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纳批评的雅量。

其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导、规谏皇帝的权力与责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经典、天意人心与祖宗法度，对皇权施行约束。这种约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士大夫必须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或者更确切地说，集体的道德败坏会使士大夫丧失约束皇帝的力量。

衡量士大夫集体道德败坏的标准，不是个别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这个群体是否陷入恶性分裂。所谓恶性分裂，指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尚存竞争，互相攻击，甚至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现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单等。

一旦陷入恶性分裂的局面，忠义廉耻必然变成虚伪的口号，士大夫必将跌下道德制高点，沦为权势的奴仆，而皇帝也将失去超越性，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一个王朝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政治的逆转

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政治的逆转，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常。神宗少年即位，力图为其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首先，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朝廷的政策倾向。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在朝廷国家的目标与社会利益之间追求平衡的政策倾向消失了。不管变法派如何标榜摧抑兼并，凡事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但是神宗的府库里积攒下来的钱物是事实俱在的。

哲宗即位之初，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

笔账，今天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总计达一亿贯以上。而这是在神宗对西北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的钱物。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

至于新法推行人员的违规操作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损害，王安石的态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问其“实利”多少，功状如何。处理程昉淤田广害民稼案，处理王广渊在京东强制推行青苗贷款案，皆如此类。

其次，王安石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恶性分裂出现在哲宗亲政以后，然论其根源，则必上溯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本人反对“异论相搅”，主张“一道德，同风俗”。在王安石的纵容鼓励下，神宗不再承认批评是一种正向的力量，斥之为“流俗”，理直气壮地拒绝约束。

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那还有什么可以约束皇帝的呢？王安石还告诉神宗，上身即祖宗，活着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听命于太庙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彻底解放了，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中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

神宗朝的专制，按照时序，首先表现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专制，然后表现为皇帝的专制，宰相沦为高级秘书，南宋政治中特别突出的“权相”现象，即滥觞于此。这两种专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专制。正如刘子健先生观察到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政议政的空间近乎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

最终，以逐利为目的的政策倾向，斤斤计较的赏格罚条，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其极端典型是神宗御笔亲题的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的吴居厚。如学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将新法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正是利益的算计和官位的升迁。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士风开始形成。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的行政作风，一时烟消云散。

神宗与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如遇，被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叹为天意。这天意的背后，是君臣间共同的思想基础。王安石与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

响。南宋的李焘作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位之前，神宗曾亲自抄写《韩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集权转向。

让学术的回归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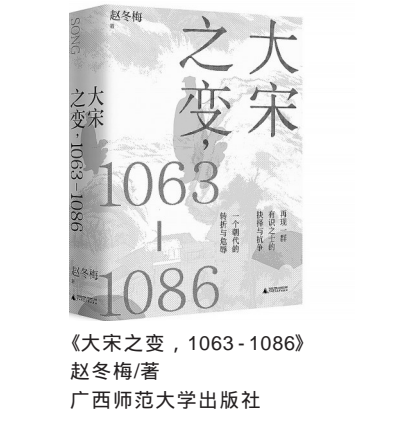
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把它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

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从现在看显得非常先进，具有现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额信贷、免役法像现代税制，然其本质却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释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的逻辑去解释、包装，这种做法，是打着历史的旗号反历史，必须警惕。

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国家政策，政策要实现，必须作用于社会，因此，要评价新法，必须看它在当时的实施效果，包括对朝廷和对社会两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新法具有强大的敛财功能，与民争利，富国强兵。

综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难断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对宋朝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个人认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最早的“中国”在这里
宅兹中国 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 8月14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出宝鸡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精品143件。展品中有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文物精品，如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西周早期著名礼器何尊，记载武王伐纣准确时间的国之重宝利簋，记录周王世系的墙盘、迷盘。青铜器作为祭祀、宴享的礼仪之器，某种意义上堪称沟通人与自然的神器，其表面铸刻的金文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成就功名、光耀祖先、万年永宝的热诚企盼，也时时透露着他们对于世界、人生、价值、生死的诸多认知。
①何尊，西周早期，铭文中有“中或（国）”的本义为诸国之中、天下之中。1963年陕西宝鸡县贾村镇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②利簋，西周早期，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是在甲子日。1976年陕西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③展厅一角。
余冠辰/摄

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不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兴衰的大事。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还能虎口夺命。

吴鹏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地关系一直高度紧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自古就是传统经济伦理和道德风尚的重要内容。老子的《道德经》中所说“三宝”之一便是俭。《左传》曰，俭者，国之宝也。古语云，节俭之行，君子攸先。

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子（晏婴）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君，名显诸侯，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时时处处以节俭为意，就连与本身地位相称的生活待遇也坚辞不受。晏子食不重肉，一餐只吃一个肉菜。同僚某岳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肉菜之外，主食是脱粟之食，即去皮壳没有精制的糙米，蔬菜不过是五卵、苔菜而已。晏子做饭以够吃为限，景公的使者突然到他家，没有准备多余饭菜的晏子只能分食之，结果使者不饱，晏子亦不饱。晏子衣着简朴，以蔽体保暖为度，甚至布衣鹿裘以朝，把省下来的钱财，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晏子以勤俭之道相齐辅政，政平民说。遗憾的是，并非每个王朝都能视俭

美食家苏东坡请客点几个菜？

为国宝。三国曹魏后期，奢纵之风弥漫朝堂。魏晋禅代，西晋建立的当月，即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就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下诏大弘俭约，力图扭转奢靡风气。司马炎下令从皇宫中撤出珠玉玩好之物，却将之颁赐王公以下，间接诱导开启了王公大臣的奢纵，导致朝廷炫富之层层出不穷，弘扬节俭的政策竟然走向反面。

驸马王济身为皇亲国戚，性豪侈，丽服玉食，公然带头违背武帝恭俭国策。武帝曾到其家赴宴，王济供饌甚丰，所有餐食悉贮琉璃器中。其中有一道蒸豚味道特别好，武帝问起烹饪方法。王济答道，以人乳蒸之。武帝当即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武帝虽然个人极度反感奢侈浪费，但因权臣不振，在制止贵族重臣的豪侈行为上一直有心无力。西晋开国元勋何曾性奢豪，劣在华侈，衣食住行，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平日吃的蒸饼上不垢作十字不食，即不蒸出来十字开花的形状就不吃。每次进宫参加御宴，何曾都看不上御膳房所做的饭食，觉得不如自家厨房美味，无法下咽。武帝辄命取其食，就特许他赴宴时自带美食。何曾食日万钱，一天的饭菜就要耗费一万钱，以致留下“何曾食万”的成语典故，还犹日无

下箸处。大臣刘毅等数劾奏曾侈无度，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

软弱的武帝后来甚至随波逐流，参与到重臣贵戚的斗富争豪之中。武帝舅父王恺与大臣石崇互相以奢靡相尚。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常见的赤石脂做涂料，石崇就用当时难得的花椒刷墙。二人一时不分胜负，武帝亲自下场助恺，赐给他一株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的珊瑚树。王恺用这棵珊瑚树向石崇叫阵，石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随后让人拿出发六七株高三四尺，条干绝俗，光彩耀日的珊瑚树。王恺看罢，怅然若失。

在朝廷大臣的竞相炫富和武帝的推波助澜下，新生的西晋王朝不但没有一点新朝气象，反而很快气息奄奄。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八王之乱兵连祸结，西晋统一全国仅37年就被乱华的五胡所灭，导致中国古代历史进入长达将近三百年的南北大分裂时期。

隋唐再统一之后，吸取西晋斗富奢纵的灭国教训，勤俭成为上至皇室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同价值追求，尤以隋文帝、唐太宗的身体力行为甚。有关关中地区闹饥荒，隋文帝派左老亲信出宫察民情。亲信给他带回百姓吃的杂粮豆腐，文帝看过之后泪流满面，从此不吃酒肉将近一年。即使是平时御膳，文帝

也只吃一道荤菜，后宫嫔妃的衣服都是多次缝补才换新。开皇之治时期，隋朝经济在历经三百年战乱疮痍基础上的迅速恢复，和文帝的勤俭为政密不可分。

在节俭方面，文帝对诸子也是严格要求。他曾告诫太子杨勇，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因奢华而得长久者。杨勇与秦王杨俊、蜀王杨秀等诸王之所以被废，固然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也和他们生活上的奢纵有莫大关系。而文帝没能识破杨广简约朴素假面具背后的穷奢极欲真面目，更是导致了隋朝二世而亡。

隋文帝在对皇子节俭教育上的失败，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持清静俭约、勤俭治国，打造出贞观之治的太宗，尤其注意加强对太子李治的教育，以确保治国路线的延续。太子临食将饭，太宗借机问道：汝知饭乎？太子回答：不知，太宗告诉太子，凡稼穡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端饭碗就要想到农民在地里劳作的艰难，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确保粮食丰收，官民百姓有饭可吃。

在现场教学之外，唐太宗还注意加强书面教育。他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其中《诫盈第七》诫勉太子，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天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

或在古代生产力、尤其是粮食产量大体恒定的情况下，奢侈浪费必然会过度使用民力，导致百姓铤而走险；只有勤俭治国才能确保百姓生产生活正常有序，实现长治久安。故在《崇俭第八》中，太宗直接明确地告诉李治，圣世之君，存乎节俭。

勤俭是中国古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节俭亦是古人修身养性的品德操守，《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认为：俭近仁。中国古代节俭思想并不是一味强调俭省、混灭人欲，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在承认正当需求的基础上否定贪欲，用理智克服物质利益对内心的诱惑，从而涵养内心。故诸葛亮《诫子书》言，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俭以养德，在众人皆以奢靡为荣的北宋中期，司马光独以俭素为美。在劝导儿子司马康崇尚节俭的家训《训俭示康》中，司马光要求儿子以俭为美德，并对《左传》中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进行了深入阐释。司马光认为，节俭是品德高尚的标志，有德者皆由俭来也，节俭寡欲，可以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利益所惑，这就是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奢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离非家；而奢侈是罪恶的源泉，侈则多欲，奢侈必然导致欲望过多，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或是贪慕富贵，枉道速祸，或是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或司马光同时代的苏轼，不仅以诗词书画流芳千古，还是著名的美食家，自称老饕。东坡肉等一百多种东坡菜美食，相传大多都出自苏轼之手。可就是如此热爱美食，表示要聚物之天美，以养吾之老饕的苏轼，在饮食生活上却异常节俭。他曾写下《节饮食议》给自己定下规矩，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平时自己吃饭，一杯清酒，一个肉菜；有尊客盛饌则三之，可损不可增，请人吃饭不超过三个肉菜，甚至可以酌情减菜；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别人请他吃饭也不能超过三个肉菜，否则安分赴宴。苏轼如此节俭的用意，一日安分以养福，二日宽胃以养气，三日省费以养财，这正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注脚。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不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兴衰的大事。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还能虎口夺命。春秋末期，昏庸的晋灵公派人刺杀大夫赵盾。刺客钻进赵家后，见赵盾正在吃晚饭，餐桌上只有一条鱼。按照春秋时期的饮食等级制度，赵盾身为卿大夫，按级别可以享受一餐吃掉一头猪的生活待遇。而一餐只吃一条鱼，是普通士人的用餐标准。刺客见赵盾晚餐只有一条鱼，不胜唏嘘感慨，认为赵盾为晋国重卿而食鱼，是子之俭也，遂不忍刺杀如此节俭的赵盾，可又不能违抗国君的命令，只有自刎而死。而赵盾因为节俭，从刺客剑下躲过一劫。（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